

## 與淡江大學法文系Robert教授談文學

訪問人：藍健民

摘記：鄭光伶

**在全球不景氣的時代，作為一位文學教授，可否首先請您談談，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此外，究竟是什麼動機讓您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現今全球經濟除了歐洲、美國呈現不景氣狀態，中國大陸也處於經濟成長停滯的狀況之中，在這樣的時代裡，文學便以一種撫慰人心的奢侈品姿態存在。事實上，我們更要了解到不管處在怎樣的時代，文學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我們將普魯斯特的小說翻譯成德文，對當時的戰敗國德國來說，普魯斯特的小說有如一種奢侈的戰利品，閃閃發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戴高樂將軍的隨扈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本身亦是普魯斯特的熱愛者，更曾於1944年法國光復之後，在德軍佔領區的一棟房子裡看到普魯斯特的小說翻譯本。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即便是處在政治、經濟都相當動盪不安的戰亂年代裡，文學撫慰人心的重要性。

至於我為何走上文學之路，一方面除了興趣，另一方面則由於從小我便理解自己不適合走理工路線。因此，走上文學之路後，擔任教職除了可以更加充實自己的學識素養，還可以一邊從事創作。至今我寫了三本小說及一些散文集等。一路走來，其實也曾有人建議我擔任記者，可以

四處遊歷，但是教書終究還是我的第一選擇。現逢淡江大學法文系的楊淑娟主任邀請我來擔任一個學期的文學客座教授，我看著楊主任每日除了教學，還得為了行政事務從早忙到晚，看來在台灣，當一位教授還真的是非常忙碌辛苦的呢！

**除了教書研究以外，您寫小說也從事翻譯並主編不同的文學雜誌，如今您已從巴黎第三大學退休並在台灣淡江大學法文系擔任客座教授。您一生從事法國文學的研究與工作，可否請您簡單談談「法國的文學精神」？**

要回答何謂「法國的文學精神」很難一言以蔽之，但我想，要解釋法國文學精神，可以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最後一卷所提到一段話作為代表，那便是「真正完整地經歷過、體驗過的生活，就是文學」，普魯斯特要表達的是，文學給予我們體驗生活的方法、進而去明白與體會生活的本質。

此外，若以實例來談法國的文學精神，那就不得不提到法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鞏固爾文學獎（Le prix Goncourt）所展現出的文學與生活之融合。原先鞏固爾文學獎是為了讓新進的作家有足夠的收入可以專心從事寫作，雖然現在已不是專給新進的作家，但是仍在法國文壇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的是，每年鞏固爾文學獎的宣布時

刻是在下午一點鐘，以午間新聞時段的重要頭條在電視新聞及收音機播送，接下來的下午時間就有各種談論得獎人與作品的節目，晚間則會有得獎者的電視專訪。我想，放眼全世界，會在新聞的黃金時段以重要新聞方式處理一個文學獎者寥寥可數，這正表示對法國人來說，文學與時事、生活是理所當然地連結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很容易發現，在與法國人聊天時，會發現法國人普遍涉獵文學。種種都說明了，在法國，文學是滿滿地充實在生活的周圍。一般來說，我想，重視創新及傳承，追求個人的自由、合理主義，重視道德的、精神的、文化的價值或許比較接近「法國的文學精神」吧。

**法國有許多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和批評家…據說您特別喜歡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為什麼？他的作品有何特色？對於一位文學的入門者，請問該如何閱讀他的作品？**

由於高中時我剛好在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的舞臺貢布雷（Combray）附近念書，有地緣上的關係，加上當時的哲學老師正在寫關於普魯斯特的博士論文，所以多少受其影響，開始了我與普魯斯特的初接觸。70年代我在美國求學時，也時常參加一些與普魯斯特相關的座談會，其中一個組織每年在聖誕節至新年期間，會舉辦多場普魯斯特的研討會，在那裏我聽見許多熱愛普魯斯特的學者專家分享自己與普魯斯特小說邂逅的緣由，非常有趣。

至於普魯斯特的作品特色，在於每個人都會在書裡的字裡行間發現普魯斯特在為自己書寫，並在裏頭找到與自己的人生體驗的關連。閱讀普魯斯特的小說首先不要覺得困難，可以試著從貢

布雷的童年時光開始讀，接著跳讀最後一本，以這樣的方式較容易入門。其實只要有足夠的閱讀時間，例如一段比較長且完整的假期便可達成，文句艱澀絕不是閱讀普魯斯特的障礙，事實上，普魯斯特的小說中並沒有晦澀難解的部份，他的文句雖長，但是表達清晰、講求與讀者之間的溝通。普魯斯特就像是法國文學界的名牌，是一位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如果要閱讀法國文學，那更必須從「文學名牌」普魯斯特的小說開始讀起囉！在法國，普魯斯特的讀者族群相當廣泛，從計程車司機至退休教師都有，相對地，我相信台灣的讀者也是任何人都可以讀，只要你有耐心。

**另外，請問在20世紀初普魯斯特的時代與當今的法國人對寫作擬表達的事務或理念是否有所改變？**

普魯斯特本身繼承19世紀多位作家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以及蘇格蘭作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等影響，偏向日常生活描寫，寫作風格亦是綜合體。

20世紀有一段時間，普魯斯特的作品在法國作家間較不受注意，其後作家及評論家如羅藍巴特（Roland Barthes）等則表現出對普魯斯特的濃厚興趣，但同一時間，從事存在主義創作的卡繆（Albert Camus）與沙特（Jean-Paul Sartre）則表現興趣缺缺的模樣。回顧近30年的當代作家，我相信很多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普魯斯特的風格浸染，在他們的作品中使人感受到其吸取普魯斯特影響的意味，雖然文筆不同，但是本質上仍表現出來自普魯斯特的傳承。

## 您第一次來台灣，依據您的觀察，台灣的文學環境與法國有何不同？例如文學的閱讀人口、出版、翻譯、政府的政策…

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到台灣當客座教授，且停留時間不長，很難有深入的觀察，平時我在大學講課所接觸到的大多是教法文或是文學的同事、對法文有興趣的學生及信鴿法文書店的相關人士，沒有機會遇到其他相關的專家或是官員。雖然過去我常受邀至日本、印尼、菲律賓等亞洲國家進行演講，所以對亞洲多少有認識，但是因為此次駐台行程，所接觸者相當有限，所以很難就這點有詳細的說明。

## 可否談談您對台灣的印象？

台灣是一個行政效率極高的國家，我很難找到可以與台灣比擬的其他國家，台灣的社會制度運作良好，台灣人對旅人親切、喜歡幫助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此外，令我驚喜的是，在逛商店時常有店員給我試吃小點心，相當有口福。駐台期間，我居住在淡水，那是個很棒、很美的地方。總體來說，我對台灣的印象是相當正面的。

（本文受訪者M. Pierre-Edmond Robert為巴黎第三大學文學教授，口譯：卓鳴鳳、藍珮華）

## 附 錄

### 普魯斯特的書信：介乎日記或者傳記

羅伯(Pierre-Edmond Robert)

翻譯：吳錫德

當代英語小說家博頓(Alain de Botton)出了一本引人發噱的書，書名及內容皆屬：《普魯斯特如何改變你的生活》。不過，這可是再嚴肅不過的定義：「在這當中我們可以認定《追憶似水年華》這套書乃是一封比平常為長卻沒寄發出去的信。」

的確，這封比平常為長的信並沒有寄給該寄的那個收件人，而是公開出版了。這本書拯救了一個生命（指普魯斯特）以及一個被遺忘的世界。

書信作為一種文體，一向與傳記關係密切。儘管它納入其他文類，從小說敘述到詩歌，尤其是私密日記。其整體特徵極易為人所辨別，原因是它有著慣有的標識：時間和地點的加注及書信體傳統的套句，或者不予理會。箇中理由至為明顯，因為它就是想要被閱讀，書寫者就得想出一二個溝通的策略，去宣告書信內容的梗要。它的前言包含有禮貌性的致意用語，以及盡可能去消弭可能會引發收信人不快的負面反應；或者激發收件人的同情，或者至少專心地閱讀它。如果是經常通信的對象，在這之前書寫者已寄了一些信，此刻就會強調其延續性，以及這項溝通的正當性。信首（及信尾）的套句沒有口頭說法那樣明顯，信的主幹則是依傳統分段方式，依著口頭論述方式進行的。

萬一書寫者沒有標明暫此擱筆，出版商通常都會依著傳統，採用相同的格式及排版，且依著信件順序排列。偶爾也會在適當位置排入沒有標明日期的信件。信尾的祝詞結束了書信的論說，同時約定新的魚雁往返時刻。這些祝詞經常十分虛誇，即使是慣用的「客套」語，致上的永遠是「最誠摯的感情」。即使有些人不愛此套，在擱筆時也不會脫俗，採用最誇張的說法，以「很快就相見」(A très bientôt)結束。在這層意義上，《追憶似水年華》的開啟與結尾可說完全吻合，只是它是一封長達三千頁的信！

與19世紀大多數的小說家不同，普魯斯特似乎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虛構及通信取代了它。日記與書信有著共同之點；時空的注記、第一人稱的書寫、片段的持續性，以至於有人認定在某個時段內密集的通信，或者所有的書信往來皆可視為日記。此外，開創某個交流的場所，與自身的、最常見的書寫形式就是日記。但不僅此而已，與他人共構的書信關係也是一個相似的例子。為指涉某人，他們都會採用縮寫詞、暗語、綽號。以及再現某個相同的主題、關注對象，以及它們的呈現等。書信也如同日記那般脆弱，輕易地就遭到收信人撕掉或捨棄。普魯斯特的書信大部分都得以保存。在他過世之後也都付梓出版，有的還附上當事人的評注。多虧有了這些獨特的書信，也多虧有由科爾布(Philip Kolp)整理及評注的21冊書信集(1970-1993)，我們才得以看到一部「普魯斯特傳」——這是科爾布在第4集封面的書名。這些書信以系列方式呈現，從1879年起（那時普魯斯特才8歲，應是最早取得的一批），直到他過世（1922年）；這些就彷彿他的日記一般。新的版本即將問世（七星社文庫），它增錄了許多新找出的書信；如此補圖全了日記，也修訂的傳記。

儘管寫了成千上萬封書信，但並未讓普魯斯特成為著名的書簡作家。因為這些書信與他的作品有著截然不同之處，以致有人不屑一顧。1930年，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就是第一個跳出來為文批評的。其他的人也都認為普魯斯特的書信寫得平淡無奇，甚至荒謬可笑。唯獨那些將普魯斯特的書信當作傳記的材料（但普魯斯特談到自身時，至少在我們可見到的書信中，都是採用隱喻式的）；或者想去重建寫作《追憶似水年華》不同階段的人士。他們仔細研讀並校對普魯斯特手稿、清樣校稿，或者構思重新安排冊及順序的日期。不過，我們也可以舉出相反的例子、譬如弗雷斯(Luc Fraisse)撰寫的《書信鏡中的普魯斯特》，或者就信論信，只閱讀他的信本身而已，我們便可清楚地認知到一個某人與《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是截然不同。除了將自己的私生活弄上舞台，引發其收信人注意的策略，不論是他的至親好友、出版商、銀行家等，我們也可從中窺見他的文學體系的元素。因為當中若干寫給他私交好友以及浮華世界的熟識，包括斯特勞斯夫人(Madame Straus)、瑪莉·沙因克維奇(Marie Scheikevitch)、路易·德·羅貝(Louis de Robert)的書信裡都有著他的文學評論的片段。這些都沒有出現在普魯斯特想寫或宣稱要寫的文章論著裡。總之，這些都沒能寫進他的書裡。

通常，觀看日記或者書信的讀者會依循著協調一致的原則予以詮釋；並從這些不相連貫的時間點，反覆出現、對稱或者自相矛盾的插曲中尋找某個實意。發生在普魯斯特的情況亦屬相同，讀者也是要面對一種多面貌的書信，去評估、比較、體會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試著去重建一個生命以及再現這部完整且生成中的作品的發展過程。的確，科爾布自己也確知他所整理出版的

五千封信仍不及普魯斯特的通信的三分之一。普魯斯特寫給他親密的男伴司機阿戈斯蒂內尼(Alfred Agostinelli)，以及在一次大戰身亡的外交官好友費奈隆(Bertrand de Fénelon)的信全都給焚毀了。而寫給另一位男伴音樂家哈恩(Reynaldo Hahn)以及文學家都德之子呂西安(Lucien Daudet)的也只找到部分手稿而已。

讀者也同樣要克服失望，因為普魯斯特在通信中很少寫到《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種種，要嘛只是採用一種詼諧的筆調。全部讀完這些書信仍屬必要。在書信中，每一封信都是另一封信的回應。即便書信中沒談到自己，每個人可依著自己的方式閱讀，並在當中找到一個延續的生命、一位工作中的作家。普魯斯特的書信讓他自己成了《追憶似水年華》書中的某個或某幾個人物，至少是該書的「作者」——為此，他是以自己的名義發言的(頻率最高的段落出現在他最後的幾部作品中)，並告訴我們書中所描述的都是信而可徵的，就如同在我們最為渴望過的生活那般。

我們也可以從推論中得知某個小說人物發展的階段；根據勒杰納(Philippe Lejeune)在他的論著《自傳契約》裡所下的定義：「某位真實人物以詩體方式呈現的回顧敘述可印證他的存在，特別是這個人物強調他個別的生活，尤其是強調他的個性的發展歷程。」

透過閱讀這種書信自傳體是否比透過閱讀《追憶似水年華》這種小說自傳體來的更具正當性？《追憶似水年華》一出版即便鎖定，讀者想去印證這些線索。普魯斯特隨即予以駁斥，並視為荒謬。1918年4月20日在寫給小說家拉克戴勒(J. de Lacretelle)回覆道（德氏曾詢問他的典型為何）：「親愛的朋友，我書中的人物並沒有線索，或者某人有著八條十條的線索。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貢布雷(Combray)教堂；我個人的記憶就是『典型』，它可以豎立起好幾座教堂。」如果我們仔細地核對，便會發現普魯斯特的說法是有著些微的差別的，但還不至於到否定它的地步。

緊接著，1919年3月，普魯斯特替他的畫家兼藝評家朋友布朗什(Jacques-Émile Blanche)寫了一篇序言，在文中重新提及十餘年他在其《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論集中提出的兩個「我」之間的差異問題（當時這本論集尚未出版，遲至1954年才付梓）：

批評家布朗什的缺失和聖伯夫相同，就是將藝術家已經完成的作品倒轉回去，試圖去詮釋它的精歷的路徑〔…………〕。那些我們只能從其作品中獲得的一切，是透過一個與他的同代人一樣不可能長生不老的人完成的；它摻揉一些瑕疵，卻緊緊地聚合了他具原創性的靈魂。與之相反的，這個靈魂便予以否定，嘗試透過它的工作去做出區隔。當我們碰到只能夠接觸其作品的偉大作家，看到他們竟可以將某些事物進行換置，與某些情況相互吻合，然後讓這件曠世傑作(面對它，在必要情況下，我們想起了它的作者，也就建構了一個想像的且適切的軀體)，進入到某個與眾不同又活生生的軀體那個不可知的觀念裡。

我們都相當熟知普魯斯特。他的一生稀鬆平常，只是因為將它換置到《追憶似水年華》裡而具有傳奇般色彩，為此持續引發傳記學家的愛好。儘管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裡已清楚地予以反駁；聖伯夫這位19世紀的大文評家的方法就是認定可以透過作者的生平來論定其作品。而儘管普

魯斯特已提出他反對聖伯夫的論據，當今的傳記評論家們卻仍一直將普魯斯特的生平與其作品並置。的確，在出版的通信中有好幾封提及他的苦惱，這些苦惱都透過小說的人物說了出來，像斯萬(Charles Swann)——其實他是身具主角及作者身分。此外，哈恩、呂西安·都德、費奈隆以及阿戈斯蒂內尼都是確有其人的小說人物。在《追憶似水年華》首冊《在斯萬家那一邊》裡，斯萬錯過約會，在大街小巷尋找奧黛特(Odette)的芳蹤，似乎也確有其事：1895年4月的夜晚，普魯斯特沒能找到他的男伴哈恩，第二天普魯斯特寫了一封信給他：「等著你這個小親親，等丟了，又找到了，更多愛你一倍〔……〕，更期待〔……〕，對我而言真是一場悲劇，既侷促不安又深切。只要我還活著或許我會把他寫進書裡。」（1895年4月26日的信）

奧黛特的謊言帶給斯萬的挫折，在現實生活中普魯斯特都遭遇過，包括1896年與哈恩的那一段，甚至出現在他的每一段戀愛裡。1896年7月底，他寫信給哈恩說道：忌妒是「病者的一種幻想」。當呂西安·都德不再和他交往，也令他痛楚不已。費奈隆漸行漸遠也同樣的令他傷透了心。

所有的傳記作家都是照著自己的本事及看法撰述的。莫魯瓦(André Maurois)既是箇中的評論家——1928年出版了一本論集《傳記面面觀》(Aspects de la biographie)，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傳記作家，他出版過雪萊、拜倫、喬治桑、雨果的傳記，特別是1949年寫出了普魯斯特第一本完整的傳記《尋找普魯斯特》(A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根據莫魯瓦的看法，傳記作家應該再現事實，理解而遽加論斷。傳記應當是一項藝術性的成就，透過鑽研不同期間不同主題不斷浮現的節奏予以凸顯。它的文獻評論建立起它的科學價值。因為這個價值是建立在對所有第一手資料、彼時的報刊雜誌、書信，以及作品的逐一審閱。莫魯瓦不接受透過作品來詮釋作者的方法。不過，英國史學家潘特(George Painter)倒是採用了此一方法。他寫了一本小說式的普魯斯特傳，作品中有關普魯斯特的生平有著大量的空白處。普魯斯特的生平像小說那般發展，比起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更容易閱讀，因為都予以簡化、詮釋、消除許多模稜兩可之處。這成了它暢銷之處，也至少風行了二十餘年。

傳記在書店裡經常都會很受讀者青睞，尤其是有關普魯斯特的傳記，隨著時間推廣總會不斷推出新的版本。1990年代以來，《追憶似水年華》作者的新傳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些傳記作家加注了許多極具眼光的注解、索引以及更為縝密詳實的生平，這些林林總總的文獻讓評論者可以一眼覽盡，也有些人只對某些面向感到興趣。當中佩舍納(C. Péchenard)的《普魯斯特在卡步堡》(Proust à Cabourg)及《普魯斯特和他的父親》(Marcel Proust et son père)最具代表。他是將普魯斯特的生平切成幾個面向呈現的。其他的傳記作家則是對「人」感到興趣，像迪斯巴克(G. de Diesbach)寫了一本《普魯斯特》，把普魯斯特當作《追憶似水年華》裡的人物來描述的，「一個無法實現其上流社會企圖心的自命不凡的勢利者」；而他的作品正是「一部糟糕透頂一生的成功故事」。

還有像埃爾曼(Michel Erman)敢於嘗試前人望而卻步的事，企圖「呈現工作中的作家」，尤其要「重新開創生命流」。所有這類新的傳記勾勒普魯斯特的一生，從家庭生活的小插曲到最後一集《重現的時光》(Le Temps retrouvé)手稿的最後一字「結束」(Fin)。杜謝恩(Roger Duchêne)1994年的

新作《不可能的普魯斯特》彙整並分析許多新找到的或最近出現的新元素，像公證人的檔案，它可以更清楚掌握普魯斯特一家的經濟狀況，以及新的通信和新近才出版的普魯斯特青少年時期的作品等等。

塔迪耶(Jean-Yves Tadié)所寫的普魯斯特傳記應屬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它釐清普魯斯特的生平及作品中較不那麼隱蔽的部分。在這本傳記的序言裡，塔迪耶略帶嘲諷的指出普魯斯特所提出的「異議」：「當我們開始撰寫普魯斯特的傳記，〔……〕普魯斯特本人也親自為文強烈批判這樣的文類，像在《駁聖伯夫》一書和替布朗什專書《從大衛到竇加》(De David à Degas)的序言裡，以及塑造德威勒巴里西斯夫人(Madame de Villeparisis)這個角色來現身說法。但人們還是繼續這樣的作法，普魯斯特是阻止不了別人的。」

事實上，無人不知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裡提出的那句用來否定這種文學評論方法的名言：「在於不要將人與作品分割。」在普魯斯特看來，這種方法「低估了我們只需進一步接觸就能獲知的事：那本書是由另一個『我』所完成的。『他』不同於在我們的習性、社會及惡習中所展現的那個『我』。」

就像在《追憶似水年華》的情況那樣，打從它出版起，沒有人不知道它與普魯斯特的實際生活相當吻合。也就是說，一旦作者採用第一人稱來敘述某個生命，必然會引發許多關於是否就是他本人的經歷的檢驗；同時也會對作者這個「我」與小說中出現的許多不同的表述，彼此之間的相似度那些深具意義的變化的審度。為此，所有的文獻都是有助於釐清它們。這些包括他的書信，以及作品之外的周邊文獻，譬如他所撰寫的第一部小說《讓·桑德伊》(Jean Santeuil，它始於1895年，但終究未能竟稿)，直到1922年在《女囚》(La Prisonnière)一書打字稿上的修訂文字。普魯斯特可說從未停止思辨作者與作品的生命之間的關係這個議題。在《讓·桑德伊》文稿中（1952年才付梓出版），敘述者在其序言中是以一種比小說更為虛構的方式陳述的，並對推定的那位作者「C」的生活感到無比好奇：「周遭好友及我本人皆優先看待這位活在世間的作者。」

不同於《駁聖伯夫》，《讓·桑德伊》一書中並沒有明顯討論做為作者的「我」與書信中及至親好友描繪下的「我」的對立問題。不過，透過描述者「C」的私生活幾項不甚恭維的特徵，已經挑明了這樣的二分法。在《追憶似水年華》裡的那位音樂家萬德伊(Vinteuil)及畫家埃爾斯蒂(Elstir)都是虛構的人物。我們發現前者平淡無奇的生活、「假惺惺的資產階級調調兒」與他的音樂天分之間可說毫無共同之處。同樣的，後者在之前「自命不凡的粗魯」，及之後在韋杜杭(Verdurin)的文藝沙龍裡搖身一變為「諦謝先生」(Monsieur Tiche)成了座上賓，還提出文藝革命的觀點(就像萬德伊那樣)，讓我們以他者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至於作家貝爾戈特(Bergotte)，這個人的靈感來自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他的感情生活及習性，譬如服用安眠藥等。我們都能覺察出其與《女囚》最後補訂裡的小說創作人物相對照。我們是否就此便能夠掌握作家那個「我」呢？普魯斯特提出另一個反例，透過書信的閱讀(通常認定書信是最具真實性的文獻，但卻遠非無可爭辯的)，可以從中獲得真相。普魯斯特認為：「譬如，巴爾札克的書信裡盡是一些粗魯的用語，而斯萬打死也不會採用。為此，那麼像斯萬如此細緻，且對荒謬可憎之事避之惟恐不及的人，是否就寫不出像《貝姨》(La

Cuisine Bette, 1846)及《圖爾的本堂神甫》(Le Curé de Tours, 1832)這樣的小說呢？」

我們可以從《重現的時光》這一集裡的這段話發現普魯斯特將它們合而為一來呈現事實（巴爾札克的書信及其二本書）以及小說人物（斯萬）。有關對尋找事實與想像、小說人物及地點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聯的妥當性的懷疑，普魯斯特早已經在《讓·桑德伊》的序言裡表述清楚了。

生命因經歷且依著成就的型態而確立，作品也循此方式而有其生命。透過閱讀作者的書信可以補足某些遺漏。就像拼圖遊戲那樣，它是透過組合片段才得以完成的。而這些片段俯拾皆是！作家在創作時並不會僅侷限在其生命、生活周遭、友誼及愛情，也包括他所閱讀過的書籍，經典的或非經典的，以及他所聽聞到的一切。作品和生命兩者都永無止盡地訴諸於背景和超文本。

### 結語

我們認知到，我們不必放棄對傳記的閱讀，尤其是作家的書信。普魯斯特所提出有關作者的「我」與外在的「我」（這是由作者本人及其至親好友所寫下的）之間的區分，在清楚掌握情況下，可以認定它是有其必要的。閱讀作家的書信並非只是去閱讀一系列的插曲逸事，或者窺知作家的私密想法。這些只能看到作家生命的表象而已。相反的，而是要從另一個側面去達到作品的核心。普魯斯特強調他的《追憶似水年華》是一部小說，而非傳記。然而在這部小說裡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甚至比他原先透過調轉或者換置的事物還真實。即便他宣稱這部小說自身圓滿無缺（這點我們倒可以去做個確認），因為它已經包含了他自己的詮釋以及如何使用它的方法。

那麼，我們是否就此認定只要閱讀其作品《追憶似水年華》，而不必去讀他的傳記？事實上，你我都知，讀者們是渴望讀到他的傳記的，以至於當今的讀者在展讀他的作品之前，對普魯斯特的生平已或多或少有所知悉。因為這部作品是如此地眾所周知，這個文化現象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一旦作者以「我」來寫小說，或者他的小說具有某種傳記形式，即便是不合常理的（就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位作者就引發雙重的關注。人們想知道他是怎麼寫的，想弄清楚他生命的哪一個階段寫進了小說裡，並仔細地檢驗其真實性。這項真實的價值比他的小說的價值還高！正是在這樣的往返中普魯斯特書信的讀者樂此不疲。書信帶給讀者歡愉（在這個情況之外，很少人會公開承認他讀別人的書信會有這種樂趣），去辨識出那些敘述的主題及其方式，以及心滿意足地獲知文本是如何完成的（像在《追憶似水年華》的卷頭裡提及的貢布雷的世界），以及如何「顯現形跡，具體且逼真」(forme et solidité)。總之，這些書信就是另一種型態的作品，當中文學創作的活動就烙印在某個生命上，這個生命可以比書籍（作品）更具小說性格；反之，就像普魯斯特的真實生平那樣。

（本文翻譯者為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轉載自世界文學第三期）